

新世纪日本文学发展进程

——黑古一夫访谈录

陈世华

内容提要 日本文学在进入新世纪后呈现出了其独特性。笔者近期就日本文学在进入新世纪后的发展与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黑古一夫教授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访谈中，黑古一夫特别强调文学所起到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判的积极作用。除此之外，黑古还深入分析了进入新世纪后大江健三郎文学创作的特点、“震灾文学”的特征以及年轻一代战争文学创作倾向、日本著名文学奖特点等内容。

关键词 平成文学 黑古一夫 反战文学 震灾文学

进入新世纪，全球化进程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发展越来越迅速。另一方面，从“千年虫”恐慌开始，全球化背景下涌现出的全球性新问题也层出不穷：伊拉克战争带来的宗教冲突已经波及全球，“9·11”美国恐怖袭击事件以及在欧洲频发的恐怖事件让全世界感到恐慌，全球变暖所引起的极端天气频发，非典和埃博拉病毒让全球人类感到自身力量的渺小……同样，在进入新世纪后的日本，新问题也接踵而至：上世纪90年代，奥姆真理教制造的地铁沙林事件还留有阴影；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所引起的海啸和核泄漏事故还让日本国民心有余悸；近年来日本政府的急剧右倾，让全世界人民担心将来的日本会不会重蹈侵略他国的覆辙。可以说，进入新世纪，世界各国的发展在充满机遇的同时，也迎着挑战，日本也不例外。文学离不开社会，文学反映社会。进入新世纪的日本文学，在动荡的世界局势和日本平成经济不景气、“3.11”东日本大地震、核泄露、宗教问题、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背景下，呈现出了自己鲜明的特点。近期，就进入新世纪后日本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政治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当代日本文坛的特点等问题，笔者（以下简称“陈”）对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筑波大学名誉教授黑古一夫（以下简称“黑古”）进行了专访。

陈：进入21世纪，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面临着各种问题。在日本，既有像“3.11”东日本大地震、破坏性台风这样的自然灾害，也有因

自然灾害引起的核泄露、日本政府强行通过有可能将日本国民再次卷入战争和让世界人民再次遭受灾难的《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和《安保法案》这样的人为灾害。现在总结平成时期的文学特征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21世纪已经过去了十五个年头，新世纪的日本文学已经展露出了其相应的一些新特点。黑古先生，您能简单谈一下您对新世纪日本文学特征的看法吗？

黑古：与21世纪的文学相比而言，我认为如果要说是经过“战后70年”的日本现代文学特征的话，可以分为少数面向政治、历史以及现代社会状况的文学和多数关注自己的事情和内心世界或以娱乐为指向的文学。

具体来说，就是划分为意欲对现实社会和历史积极参与的文学，即以文明批评和社会批判为意图的文学，和仅仅消极参与社会 and 历史的文学。

对于很多宪法学者都判断为违反宪法的《安保法案》，即“战争法案”，在文学界，除大江健三郎、池泽夏树、高桥源一郎和岛田雅彦等几位文学家表明反对外，汇集了大多数文学家的“笔友俱乐部”和“文艺家协会”作为团体却没有正式表明反对。我认为，这可以被看作一个区分“积极”与“消极”的象征性事件。

另外，考虑现代日本文学，即21世纪日本文学的时候，与“3.11”福岛第一核电站相关创作的“核电小说”是不能不提及的。而“原爆=核文学”、“在日朝鲜人文学（即‘在日’文学）”和在文化与地理上都具有特殊性的从冲绳发出声音的“冲绳文学”的存在，亦是不能被忘记的。关于这些文学，在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仅者仅有几位将“原爆=核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而这也是最近的事情，对其他形成现代日本文学特征的文学领域，则尚无太多研究，而这些均是以后值得关注的研究内容。

不过，进入21世纪的十五年来，有人提出“纯文学衰退”说，进而随着手机网络和计算机的发达，出现了书卖不出去、没有读者这样的出版业不景气的问题。虽说这是发达工业国家共通的问题，但我认为这是事关文学存续的深刻问题。

陈：有人说平成年间日本文学的代表作家是“两村上”，也就是村上春树和村上龙。讨论日本当代文学，离不开村上春树，因为在全世界已经形成了一种“村上热”或“村上现象”。您也是研究“两村上”文学的专家，请您介绍一下村上春树文学和村上龙文学的各自特点。

黑古：关于村上春树的文学，三十年前的1986年，大江健三郎曾经说过，“村上春树的文学立足于拒绝对社会甚至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一切采取主动姿态。在这种前提下，他毫无抵抗地被动接受了来自风俗环境的影响，而且是一边听着背景音乐，

一边毫无破绽地编织着自我内心的梦想世界，这就是他的创作方法”^①，也就是说，战后很多作家以反战、组织与个人的关系为主题进行文学创作，而村上春树在文学创作上不是积极地、能动地反映社会问题，而是消极地远离社会问题。我比村上春树大三岁，我们这一代是在战后文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而几乎同龄的村上春树却更多地受到发达工业国美国文学的影响，所以村上文学很少关注日本社会现实问题。即便连续五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其文学倾向和方法在本质上也没有改变，很多年轻文学者沿袭村上春树文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倾向，也就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不抱怀疑态度，文学内容空洞化，我认为这才是现代文学陷入的危机状况。

也就是说，在1995年发生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和由奥姆真理教策划的地铁沙林事件后，虽然村上春树宣称自己从“不关心社会”转向“关心社会”，但在实际创作上却迷失了方向，我们读了最近创作的《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以及《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后就会明白，他的文风还是回到了以前的“不关心社会”，我实在看不出村上想通过这两部作品反映什么问题，从这两部作品，我只能感觉到作家的想象力和智慧的萎缩。

另外，可能是有意识地向诺贝尔文学奖靠拢，他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以《高墙与鸡蛋》^②为题的演讲中，虽然言明自己不是站在“高墙=强者（以色列）”一边，而是站在“鸡蛋=弱者（巴勒斯坦）”一边，但在其后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纷争中，尽管压倒性的弱者巴勒斯坦一边出现了大量死者，村上春树也完全没有再发表任何言论。同样，在“3.11”后的加泰罗尼亚国际奖获奖演讲《非现实梦想家》中，他虽然说“我们日本人应该坚持对核发出‘No’的呼喊”^③，但就后来福岛的现状，他也没有从“反核电”（反核）的立场发言。

对于村上龙的文学作品，我也写过一部评论著作。事实上，他的作品鱼龙混杂地充斥着一些和性、毒品等因素有关的内容，但其作品内容和世界、日本社会以及日本人有着深刻的关联，对于我们该做什么，该如何面对当今社会，如何面向未来，其作品感觉是非常敏锐的。其作品大多反映了现在日本社会的状态，比如2000年发表的《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反映了中学生们对日本现实不满，从而离开日本，在北海道创造属于自己的乌托邦的故事。而《来自半岛》则反映了虽然日本宣布不进行战

① 参见大江健三郎《戦後文学から今日の窮地まで——それを経験してきた者として（戦後日本精神史の再検討）》，载《世界》1986年第3期。

② 村上春樹《壁と卵》，载《文藝春秋》2009年第4期。

③ 田中裕康《村上春樹氏「核にノー」明確に、カタルーニャ賞受賞「生スピーチ」》，载《週刊朝日》2011年6月24日。

争，但实际上却难以得到美国的保护而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的预言。另外，像他在1976年发表的《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虽然作品中充满了关于性和毒品的描写，但实际上是反映了越南战争对人类心灵的扭曲。可以说，村上龙是对现代社会抱有危机感并积极以社会问题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家。

陈：日本已经有了两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您能否预测一下下一个入选者可能是谁？为什么？

黑古：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条件之一就是作品要被大量翻译成以英语为主的欧美语言，村上春树总是被提名为候选人，也是因为他的很多作品被翻译成了欧美语言。作品被充分翻译成外语的当代日本作家，除了村上春树以外并不多，所以我想他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获奖，但就我个人来说，我想推荐在长崎受到原子弹爆炸辐射的“原爆文学”作家林京子，以及深挖包括核问题在内的现代日本诸问题的池泽夏树。村上龙也有可能，但遗憾的是其作品中诸如性和毒品等重复的内容较多。

现在的日本文坛，已经很难列出像以前井伏鱒二、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等多人都有可能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状况了。

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进入新世纪后，专心于自己“晚年的工作”。这些作品包括《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水死》《晚年样式集》等。您如何评价大江进入新世纪后的创作？

黑古：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作品中“与残疾儿（弱者）的共生”（私事）和“应对核状况=反核”（公共问题）相辅相成，前者以《个人的体验》（1964）为代表，《个人的体验》是以头盖骨有缺陷的大儿子“光”的诞生为基础创作的；后者以《广岛札记》（1965）为代表，《广岛札记》是以1964年和1965年到广岛取材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经验为基础创作的。此外，荣获芥川文学奖的《饲养》（1958）和《拔苗斩仔》（1958）等作品中内在的“民俗·土俗”主题，整体构成了他的文学特征。

被大江自称为“晚年的工作”的最近的创作，我认为与他迄今为止的作品风格相比基本没有改变，仍旧在追求个人生活与社会、历史等的紧张关系的根本，即以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为主轴追问人类应该如何生活，对于否定和污蔑个人尊严的社会和时代现状提出异议。大江对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此事对于讨论现在的大江，尤其是理解其文学思想和创作方法或能有所帮助。

陈：大江健三郎在创作《晚年样式集》的过程中，发生了“3.11”东日本大地震，作品的创作方向受其影响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作品中融入了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核泄

露的事件。另外，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出现了大量的“震灾文学”，看来大事件对于文学创作显然具有重要影响。您是怎么看待“震灾文学”的？

黑古：首先，关于大江文学，他在“3.11”后并未改变其反核的一贯立场。但说到大江以外的作家如何对待“3.11”，我们可以从日本笔友俱乐部募集并编辑出版的《此时我反对核电》一书说起。该书汇集了创作、批评和随笔，可以看出并非是众人致力于“震灾文学”。但我的手里也有五十册以上与“震灾文学”相关的书籍，如此看来，确实可以说很多作家受到了“3.11”的冲击并意欲总结其教训。

忽视“事故·防灾”而以“安全·安心”为旗号强力推进核电政策的结果导致了福岛事故的发生，而现在政府却正在推进核电出口和重启核电。但是，文学界对此种“政府·权力”却缺乏批判，这是我更加关注的。

关于“3.11”，虽然有作家如池泽夏树创作了一些反对核电的作品，但总体而言，日本文艺杂志缺乏反核声音。而像村上春树那样用“日本人的无常观”^①解释“3.11”事件，可能是忘记了文学的本质作用。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论及文学的本质作用时提出了“炭坑金丝雀”理论，文学就像在炭矿中事前觉察到瓦斯爆炸危险而发出警告的金丝雀，其作用应在于对社会产生的危险发出警告。

陈：说到大事件，不得不说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进入2010年后，日本政府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和《安保法案》等相关法案，政治氛围让社会氛围表现出闭塞感。表现在文学上，我个人感觉是一方面作家创作了一些反社会、反战小说，另一方面文学创作呈现出向“私小说”方向发展的特点。您觉得在现今日本社会急剧右倾的背景下，日本文坛将发生哪些变化？

黑古：首先有一点想确认下来，在现代日本，对权力和政府稍有批判，就会被右派势力贴上“左翼”标签，而文学界反抗这种风潮的意识有时表现得很淡。特别是由于安倍政权对媒体不断施压，令很多创作者（作家）对被称作“左翼”抱有警戒心和厌恶感。也就是说，日本出现了言论自由被大幅打压的倾向。在上述前提下看现代战争文学和社会小说，可以说是战争文学少有质问“日本的加害性”的作品，反而出现了像几年前被列为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高桥弘希的《指骨》那样，以抽象形式或连环画式的手法描写战争的作品。社会小说则是致力于构思以社会现象为题材的小说，其锋芒却不触及对造成社会现象的政治和权力。目前，读者也有不喜欢权力批判和文明批评的倾向。现代日本文学总体上变得缺乏批判精神，这是我的真实感受。

^① 田中裕康《村上春樹氏「核にノー」明確に、カタルーニャ賞受賞「生スピーチ」》，载《週刊朝日》2011年6月24日。

这种现代文学倾向，可以说是感觉的退化以及想象力、智力的退化，这与覆盖全社会的反知性主义思潮有很深的关系，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反知性主义流行的原因。

陈：说到反战小说，除了像林京子和大江健三郎一贯坚持反战反核作品的创作外，40岁左右的年轻一代作家的战争文学创作也非常引人关注。比如古处诚二的《遮断》、高桥弘希的《指骨》和柴崎友香的《在无我的街上》等都引起了很大反响。当然，年轻作家的作品在获得高度评价的同时也受到了批评，认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创作的战争文学不够真实，您如何看待年轻作家的战争文学创作？

黑古：年轻作家们对战争表现出关心是好事，但古处诚二和高桥弘希这代人确实是没有经历过战争，其战争小说是在对书籍和影视的作品的学习基础上创作的，作品中即使有搏斗、冷酷的内容，也不能让人感受到战时和战后创作的战争文学所具有的反战、厌战意识与希求和平的思想。

换句话说，古处诚二和高桥弘希的战争小说欠缺当事者意识。在他们的作品中存在蔑视事实的感觉。在日本侵略战争中，日本（军）在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亚洲全境除200万士兵之外屠杀了大量无辜民众，日本人也有320万人死亡。这些年轻人的战争小说蔑视这一事实，因而无法传达真实感和切实感受。

柴崎友香的作品，就和受到村上春树影响的吉本芭娜娜、江国香织和青山七惠等女性作家一样，仅关心自己的“心象风景”以及身边世界和人际关系，这是其创作特点，也可以称为最近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她们对时代、社会和政治状况只是消极地对待，装出一副不关心的样子。我认为她们中的一部分人热衷于风流韵事创作风格，到底能不能成为名垂文学史的作家，还有很多未确定的部分。

陈：我还关注到，日本战后资本主义道路已经走了七十年，日本作家最近创作了大量反映日本社会问题的作品，比如母女关系问题、护理问题、恋爱问题和家庭问题等，还有中村文则关于“恶”的描写。这些作品是否是对日本七十余年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一种反思？

黑古：确实，在“烂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日本，出现了少子高龄化、老老护理（护理离职）、离婚率增高、恋爱问题（性道德衰退）、父母与子女断交等很多问题，可以说少部分现代作家是认真地致力于这些问题题材的创作。也即是说，现代社会所存在的大部分问题，是这个社会玩物丧志的风潮蔓延而形成的，这种轻视精神性的风潮，是离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共生思想越来越远的表现。

我认为，这基本上是“只要自己好，他人的事情无关紧要”的“利己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的蔓延和以所谓“对等·平等”的原则为基础的个人主义而导致的社会道

德衰退所造成，其结果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伦理和处世哲学支配着这个社会，而现代文学似乎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方法。

另外，现代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是桐野夏生和宫部美雪等创作的所谓“优质的娱乐文学”的焦点，而纯文学是把这些社会问题作为专门的“内心”问题来对待的。

陈：最后，请您简单评价一下进入新世纪后日本主要文学奖项，特别是芥川文学奖与直木文学奖、大江健三郎文学奖等奖项的特点。

黑古：现在，著名的文学奖，除了芥川文学奖（授予纯文学短篇小说的奖项）、直木文学奖（授予娱乐小说、系列的长篇或者短篇集的奖项）外，还有谷崎润一郎文学奖（以长篇为主）、川端康成文学奖（以短篇为主）、朝日文学奖（针对长期取得文学业绩的作家）、每日出版文化奖（针对当年热点话题的作品）、读卖文学奖（与每日出版文化奖类似），也有角川文学奖和各文学杂志主导的新人奖（群像新人奖、新潮文学奖、昴文学奖、文学界新人奖、文艺奖），还有授予诗人的H氏奖、现代诗奖、花椿奖等等。虽然立志成为作家的人们多以这些文学奖为目标不断努力，但我想现实却是如战后文学批评家平野谦在《艺术与实际生活》（1958）以及几个对谈中反复表述的那样，一个芥川文学奖作家的背后有众多想成为作家的写作者的“累累尸骨”。其象征就是从十多年前开始流行“手机小说”，在网络上存在着几万“小说家”和“诗人”，他们与其说是为得到社会的认可，倒不如说是以自我满足为目的进行创作。另外，在日本也有以自费出版的形式让自己作品面世的情况，在考察日本现代文学的时候，也必须考虑这种自称作家和诗人大量存在于社会的事实。

由大江健三郎一人担任评委的“大江健三郎文学奖”，只为获奖杰作提供作品翻译成多国语言的机会，而这一文学奖在2015年终止了。虽然不知道终止原因，但我推测可能与该文学奖很难与出版业经济轨道接轨相关。

*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日本琉球歧视问题研究”（14BWW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杜新华